

## 冷戰結構視野下的太陽花

吳鴻昌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研究領域是社會理論、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

林峯燦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研究旨趣為巫術與宗教社會學、日常生活社會學。

湯志傑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德國 Bielefeld 大學社會科學博士。以今日臺灣何以如此為核心研究關懷，近作如〈現代性的實驗室：從多元現代性的觀點詮釋臺灣在世界史的意義之嘗試〉。

## 一、從歷史視野觀察太陽花運動的意義與必要

二〇一四年的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對於臺灣社會的衝擊可以說石破天驚。不僅運動本身訴求的暫停服務貿易協議與通過兩岸監督條例，都一定程度獲得了執政當局的回應（即便是在被迫與不情願的狀態下）。此外，二〇一四年底九合一底大選執政黨的挫敗，以及青年參政、組織國親兩黨以外第三勢力態勢的浮現（也同時表現在二〇一六年初的總統暨立委選舉），太陽花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改變可以說是立竿見影。然而，正如同世界史上的法國大革命、六八年學運、中國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臺灣的野百合學運等重大事件一樣，這些運動不僅成為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同時也是人們難以越過同時又不斷翻新意義的集體記憶節點，我們相信太陽花運動也會取得如是的地位——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因此，雖然太陽花運動的效果與意義仍在持續發酵中，尚難以全面蓋棺論定。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從歷史的眼光來審視太陽花運動，探究其所帶來的衝擊與意義，並探討它為臺灣的未來發展打開了怎樣的契機。

我們之所以選擇從歷史觀點來審視太陽花運動的意義，主要的原因有三個：其一、我們相信國內對於太陽花運動的研究，絕對不缺乏從社會運動角度來討論太陽花運動所面臨的政治機會結構、內部的動員機制與構框方式（framing）等議題（例如本書其他作者吳介民、廖美與何明修），然而，我們也確信太陽花運動的意義絕對不僅於此，特別是太陽花運動對於東亞地緣政治所帶來的衝擊。其二、承上，太陽花運動對於東亞地緣政治的衝擊，不單因為它牽涉到臺、中之間的互動，更在於它的的確確牽動到了臺灣在世界中的定位問題。為了能清楚掌握臺灣當前的位置，則勢必得從二戰以來的歷史脈絡，以及臺、中在冷戰格局裡的起伏升降談起。其三、正如同新興社會運動理論家阿爾貝托·梅露奇（Alberto Melucci）所指出的，運動即訊息，社會運動不僅有其組織、結構面向，更有其認同、文化與論述面向。<sup>1</sup>因此，延伸他的說法，我們相信從歷史性脈絡來定位太陽花運動的意義，不僅是正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而且，就社會科學所具有的雙重詮釋學性質來看，<sup>2</sup>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從歷史脈絡來刻劃太陽花運動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這樣的刻劃能夠助產出太陽花的歷史意義，進而影響了人們對於臺灣現狀的認知。

總而言之，本文主張惟有把太陽花運動放到後冷戰的世界格局中理解，我們才可真切了解到它的歷史意義，也唯有把太陽花的故事場景安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安置於更巨幅

1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ited by John Keane and Paul Mi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1976.

的政經變革的脈絡中，將不僅可以掌握到太陽花運動所開展出來的潛能與契機，也可經由透徹地了解臺灣的過去，而實實在在地掌握到臺灣的現在，勇於開創臺灣的未來。準此，以下我們將依序透過冷戰到後冷戰格局的轉變、東亞地緣政治的變化（美中臺三角關係的轉變）、太陽花運動的爆發（結構、能動性與文化效應）的分析架構，來揭示太陽花運動展現出怎樣的「歷史性」，彰顯其所發揮的「能動性」不可抹滅的歷史意義。

## 二、從冷戰歷史反思臺灣在後冷戰世界格局中的定位

正如同汪宏倫等人所指出的，臺灣基本上是一個戰爭所孕育的社會。<sup>3</sup>然而，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基本上都把焦點擺在國共內戰，而忽略冷戰對於東亞、乃至於臺灣社會的形塑。<sup>4</sup>因此，底下就讓我們從冷戰到後冷戰的轉折，來討論臺灣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與轉變。

一般而言，對於冷戰，既有的研究充滿著一種習以為常的說法，大多數的研究泰半是從美國，或更精確地說，交雜著「美國勝利」與「美國失敗預言」的觀點出發。<sup>5</sup>這些研究多著重二次大戰後美國軍事力量的獨霸，並把此直接等同於美國世紀的到來。換言之，相關研究常把冷戰的起源與衰微，視為舊歐洲勢力的消解與美國崛起的過程，並相應地預設了現代世界從歐洲中心過渡到美國中心的歷史圖像。並且，在一九八九年後，隨著蘇聯體

制的瓦解，美國取得了世界單一霸權的地位，並主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全球化過程。然而，在這樣的敘事框架裡，中國的崛起似乎變成了一個格外引人遐想的異例，特別是中國會不會變成下一個挑戰美國的霸權之問題。因此，在這種既有的框架下，所謂的中國崛起或中國模式便打開了一個想像的空間，吸引著西方人，更不斷地誘發中國人，進行符合自身立場的詮釋，以致時有淪為空談之嫌。<sup>6</sup>

如果我們跳出舊有習以為常的冷戰敘事架構，改依晚近以解密檔案為基礎的最新研究成果來反思冷戰歷史，將發現以往可概略簡化為美蘇對立的冷戰情節，<sup>7</sup>明顯地忽略了不同

3 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四。

4 吳鴻昌、湯志傑，〈臺灣無可迴避的議題：欣迎《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的面世〉，《臺灣社會學刊》五十六，二〇一五，頁二四三—二四八。

5 一九九〇前後的兩本暢銷書或許佐證這種情況：一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九九二）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另一本便是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一九八七）的《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6 對於中國的崛起，研究者的態度也恰恰分成態度對立的兩種立場，對立的情形十分相似於對美國國勢的判斷。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兩本暢銷書（*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2008; 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 How It Got There, and Where It Is Heading, 2013.*）正好說明這種立場的轉換情況。

7 近來關於冷戰歷史的翻案，可參考萊弗勒（Melvyn P. Leffler）與韋斯塔（Odd Arne Westad）於二〇一〇年編纂的三卷冷戰史。

地區的差異，以及與此緊密關連的冷戰前後期差異的問題。傳統的主流敘事忽略了，在一九七〇年代前，所謂的第三世界不論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仍依附於如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等舊的帝國宗主國，而非由美國主導。同時，對不同地緣政治區塊來說，冷戰展現出不同的內含，實際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二戰後雖也直接或間接受冷戰影響，但主要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這除了涉及美國和蘇聯的外交角力，也跟當地的政治、經濟局勢有關。因此，一些研究者將非洲各地的解殖過程劃分成兩個階段，即二戰後的獨立，及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的後殖民時期。

上述這些例子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繼續著重雙元對抗的局勢、國際現實的利益、核武擴張與限制……等，將無法看到舊歐洲勢力並未如以往研究者所宣稱的消失於一九四五年，而美國也未在冷戰初期（至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便主導整個世界，更不用說美國當時根本就未發展出一套關於「世界」或「現代世界」的替代性說法（亦即無從去論斷所謂美國霸權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我們將無從認知到東亞與臺灣，以及不同地區在冷戰格局中各自的特殊位置。特別是美國如何基於冷戰在東亞的布局與經驗所發展出的現代性計畫與美國中心主義想像，以及，東亞乃至於臺灣基於冷戰格局與美國的援助，所採取的特定模式的現代化想像。

且讓我們從頭講起。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冷戰的根源或可追溯至一九一七年。<sup>8</sup>然

而，一直要到一九二二年蘇維埃體制建立，共黨政權才真正全面掌控俄國領土，而美國正式承認蘇聯更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二次大戰爆發後，美蘇並未減緩敵對，要到一九四一年，兩國幾同時面臨德國與日本侵略，始結為同盟。一九四四年後，因戰後局勢規畫的問題，美蘇又開始有摩擦。到一九四六年，對立之勢益烈，先是有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一九四七）的長電報，再來是蘇聯介入伊朗，最後則是希臘與土耳其的問題，以致觸發邱吉爾、杜魯門、日丹諾夫各自發表「鐵幕」、「紅色法西斯主義」及「兩種生活方式」的說法，冷戰雙元對立的局勢因此誕生。但這時雙方的爭議焦點仍圍繞在歐洲問題上，尤其是德國與東歐的勢力劃分。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的爆發，一夕間把原來非美蘇勢力所爭奪焦點的韓國，乃至整個東亞，變成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熱區。<sup>9</sup>

這種局勢一直延續到一九七三年，越戰停戰協定簽訂之後。在一九七三年以前，除東亞有兩次越南戰爭、多次臺海危機等衝突外，古巴與中東亦是衝突的焦點。但其他地區在此階段並未直接捲入冷戰的正面衝突，例如美國在非洲一直採不介入的態度，僅時而利用

<sup>8</sup> Eugene P. Trani, and Donald E. Davis, *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sup>9</sup>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隱蔽行動或小規模戰爭的方式，協助獨立運動，並對抗共產勢力。因此，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的冷戰時期，絕大多數戰事都是發生在東亞，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線由北往南延伸，從韓國延伸進臺灣海峽，最後進入越南。

一九七三年後，冷戰進入新的階段。美、蘇開始直接介入世界各地的衝突（如美國介入智利、美蘇介入安哥拉獨立戰爭與伊朗革命，及蘇聯入侵阿富汗），令冷戰正式全球化，但同時也會直接進行協商。此外，還出現了美、蘇、中三角賽局，以及歐洲同盟於一九七五年後逐步形成的多元發展。我們因此可以觀察到一種背反的發展軌跡。一方面，限制核武談判持續進行，並取得成果（如一九七一年SALT I的簽訂，但第二階段的協商因冷戰於第三世界加溫，及美、中關係趨緩而一再停頓）。但另一方面，核武發展與軍事對立卻更加白熱化（尤其是一九八二年總統雷根所提出的「星戰計畫」）。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背反的發展同時卻伴隨著中國與西北歐的分離運動。因此，當美、蘇各自因為對立而付出龐大的人力、物力，進行彼此的封鎖與對峙，實際上不但改變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其幅度更超乎美、蘇兩國本身的變化。

更明確地說，一九七三年會成為劃分冷戰前後階段的關鍵，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石油危機結束了西歐與美國戰後二十多年的經濟成長趨勢——儘管趨於疲弱的徵兆一九六〇年代已經出現。其次，出現了從反對西方／歐洲到反對西方／美國的轉折。雖然「反美」

之前早所在多有，但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後，它有了新的面貌與意義，開始明確地指向拒絕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及相應的思維或生活方式。最後，越戰在持續十多年後終於結束。同時，中、蘇關係惡化（對峙與衝突的高潮在一九六九年），而美、中卻開始朝所謂正常化的方向發展，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事件自是季辛吉與尼克森先後訪中，並簽訂《上海協定》。

因此，對比前一階段的冷戰，一九七三年的重要性在於以下幾點：

（一）經過兩次石油危機引爆的經濟危機後，西歐不得不面對以歐洲為主導的世界已經瓦解的殘酷現實，而這不僅牽涉到實際力量對比上的衰退，同時更涉及定義「世界為何」的權力。

（二）美國雖在二十世紀初便躍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二戰結束時美國文化仍非全球性的強勢文化。兩次大戰帶給美國的最大效果，是從僅有十萬常備兵的國家轉變為軍事大國，及相伴的經濟實力巨幅成長。美國文化在二戰後雖開始發揮影響力，但其取得世界性的全面影響力，主要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事，而這與一九七三年後冷戰下世界格局的轉變緊密相關。美國除轉變自由主義的說法，並藉流行文化行銷全世界，還變革經濟體制，從福特主義轉向彈性生產體制，並走出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廣泛地施行金融自由化的

策略。<sup>10</sup> 隨著軍事力量與預算的擴張，同時也相應著美式文化與美式生活方式的全球推廣，美國終在冷戰結束時，取得前所未有的霸權地位，使其勢力深入世界各地。

(二) 相較美國的轉型，蘇聯卻未走出一九七三年以前的框架。不論在軍事、政治或工業生產體制上，蘇聯依然維持舊有的運行方式，以致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盧布的流通率與國際重要性並不強勢，難與美元競爭。<sup>11</sup> 而且在意識型態上，共產主義首先在東歐出現危機，之後也在蘇聯轄下的各共和國浮現出式微的趨勢。在這些地區，民族主義的勃興及民族自決的呼聲，弱化了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冷戰的結束雖難以預期，造成此結果的因素多樣而複雜，但可肯定身分政治在其中扮演了至為關鍵的角色。恰堪對照的是，美國文化或美國的經濟文化（甚至政治文化），在冷戰的漫長過程中，最大的改變與其說是消費文化或開放的心靈，又或自由化的經濟活動，不如說是身分政治。身分政治而非階級政治為基礎的文化模式，改變了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世界。而這種身分政治卻是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人民漫長抗爭的產物。相關的身分政治在二戰前雖已逐漸浮現，但並未成為美國概念的基石，遑論用它來征服或重新規畫世界。

透過前述冷戰史的重新考察，我們將發現，美國的崛起是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而冷戰則對此有著無可否認的貢獻。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美國崛起的過程恰好與東亞的歷史處境緊扣在一起。有別於東南亞、南亞、中東或非洲等其他地區，在二戰結束後，美國

基於日本帝國的潰散及歐洲帝國勢力在東亞退卻的權力真空狀態，循著原來日本殖民、掠奪或治理東亞地區的理路，最早在東亞建立起其統治世界或成就世界霸權的第一個實驗場。儘管這係事後回顧證成，而非當時的歷史必然，就如同韓半島在美國原本的全球戰略布局下實無足輕重，卻因始料未及的韓戰而頓時成為戰略關鍵要地。之後，隨著冷戰持續延燒，美國與東亞的互動關係／經驗，令東亞最終成為美式現代化理論的模範地區。同時，建基於處置東亞局勢的經驗與成就，美國才能晉升為世界秩序的重新定義者。

美國在戰後雖管轄日本，但對日本的重建與復甦原本並不積極。韓戰爆發才轉變了美日的關係，促使美國投注大量資金、人力與技術。在去除軍備的前提下，美國認為促進日本的富足與繁榮，將可抑制共產主義的蔓延。<sup>12</sup> 在本身的努力，加上美國大量的軍事與民生需求下，日本終創造出持續的經濟成長——但係建立在美日間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上不對等

10 S. 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1 O. Sanchez-Sibony, *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的基礎上。當美中關係開始邁向正常化，乃至於一九七九年正式建交後，日本順勢扮演了輔導或協助中國的角色。這種輔助的角色可從日本官方對中國的經濟援助（ODA）看出：自一九七九年起，遲至二〇〇八年為止，來自日本的經濟援助估計超過三兆日圓。此經援不僅纾解了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資本壓力，也反映出冷戰的和緩，甚至終止的趨勢。

因此，儘管美國以往一直是將中國視為蘇聯的代理人（特別是一九六〇年代中蘇分裂前），或是看作比蘇聯更難理解與應對的共產國家（如介入越戰及在第三世界大規模資助反美勢力），但一九六九年以後，美中卻在各自的考量下形成聯盟，並在走過尷尬的十年後正式締交。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美國更展開資金與技術的挹注。這顯示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或角色設定，從對立與防堵轉變為合作——儘管合作也可能是另一種型態的防阻。相應地，我們不妨說，美中的冷戰在一九七九年已告結束，甚或可推至更早的一九七三年。此後，萬惡的共產主義似乎不再包含中國，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尤其如此。因此，有別於西歐在一九七三年後趨於衰弱，中國卻是日益奮發興起。但冷戰格局卻又同時封鎖了中國與西歐的發展，特別是關於之後的發展路徑與想像。換句話說，冷戰既造就了歐盟，同時也造就了崛起的中國。冷戰前期的態勢協助了西、北歐國家走出大戰的廢墟，而後期的冷戰則幫助了中國脫離一百多年的恥辱。然而，兩者的最終結果是否相同？這是可以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從前述的長期歷史脈絡回頭看臺灣，將發現冷戰格局對臺灣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它決定了臺灣擺放的位置。<sup>13</sup>二戰結束時，臺灣依幾個大國先前的決議，交由國民政府統治。臺灣的定位雖與強權的決議有關，卻是無足輕重的地區。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國民黨退守臺灣，同時冷戰已在歐洲展開，雖令情況有些許變化，但臺灣基本上仍與冷戰無關。到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才真正轉變了臺灣的位置。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美國大幅度援助國民政府（僅就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間，總金額超過二十六億美金），期待國民政府可做出貢獻，遏阻共產勢力的擴張——儘管美國國務院當時的研究報告對此抱持悲觀。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與一九五八年兩次的臺海危機（第一次危機為九三砲戰，第二次則是八二三砲戰），迫使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Dulles）於一九五四年底來臺協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美國國會也於次年初通過臺灣決議文，賦予美國政府保護臺灣安全的法源基礎。臺灣此後不僅成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一九五〇年麥克阿瑟將軍的說詞），同時也成為防堵共產主義的防禦陣地，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如同「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或美國與各太平洋國家所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一樣，乃形成所謂的「舊金山防禦體系」。<sup>14</sup>這樣的定

<sup>13</sup> 要強調的是，擺放並不意味著「擺弄」，就像位置不等於「位置的占有」。現實如何發展，仍有賴施為者的選擇與行動。

<sup>14</sup>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6.

位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九年。之後，隨著美中關係的活絡，臺灣不只退出聯合國，更與美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而僅能靠一九七九年生效的臺灣關係法，重新定位臺美關係。

所以，當冷戰進入第二階段，臺灣已從反共不可或缺的一「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轉變成「美中關係的籌碼或砝碼」，擺盪於兩強之間的命運取代了防堵的角色。表面上，隨著美中冷戰的終止，臺灣的冷戰似乎也於一九七九年終結。但實際上，在冷戰的最後十年，甚至當世界已邁入後冷戰的時代後，臺灣一如中國，某程度上依舊迴旋在冷戰本身或冷戰所遺留的格局裡。同樣地，不論在冷戰或後冷戰的國際局勢裡，臺灣與中國表面上雖處於不同的國際地位，發展趨勢也有往下及往上的巨大差別，但若我們仔細檢視上面的脈絡將可發現，臺灣雖處於下降的趨勢，但這並未改變臺灣所擁有的關鍵位置，因此依舊很重要。相對地，中國雖在往上升，卻將面對已然被禁錮在偌大的陸地板塊上的尷尬事實。換言之，它雖強大，卻未必力足以脫離身處的板塊。而這種強弱逆轉的詭異關係或辯證關係，正好是冷戰的重要遺產。

由此反思，冷戰的確對臺灣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其效果不全然負面。無論如何，所謂的「臺灣」絕對無法抽離出冷戰的轉變過程，就如同美國與全球化歷程的關係一樣。我們已經看到，臺灣本身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受冷戰影響，雖然在不同時期層次與具體效果不盡相同。事實上，包括臺灣中立化、臺灣未定論、民族／民主自決說、兩個國家說、內戰延伸論等我們熟悉的諸多論述，也就是何謂「臺灣」及「臺灣人」的問題，迄今某程度上一直都還是在冷戰的框架中討論。

要強調的是，雖然冷戰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方式決定了臺灣的位置，但對那個位置的占有仍取決於臺灣人自己的作為。何況，既然「決定」終究來自人的決策作為，它同時也就意味著機會。從過往的歷史來說，臺灣毋寧是善於掌握機會，而有所成就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冷戰或後冷戰的格局中，臺灣一直處於一個封鎖的區域中，既執行封鎖的功能，同時自己也常被封鎖住，更造成臺灣與中國共同封鎖在同一區域內的結果，因此，「臺灣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崛起的真正試金石。雖然不少人心態上會認為，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似乎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問題，但如前所述，在美中建交後，國共問題實際上已逐漸消失。因此，若我們切換視角，國共問題反而恰恰變成一種限制住中國的框架。由於有此框架，中國根本無法展現出乃至思考「臺灣問題」之外的世界格局。幸而，這樣的框架在臺灣已大幅失去民意基礎，「後國共內戰」的視野已逐漸成形，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新的，超越國共內戰框架的觀察臺灣自己與世界的視角。

## 三、冷戰與後冷戰格局下美中臺三角關係的變化：從美援到 ECFA

從前面冷戰史的檢討，我們可清楚知道，要討論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一定不能忽略美援。包括軍事與經濟援助在內的美援，是二次大戰的產物。在二戰初期，美國為援助盟國，便曾提供多達四百九十二億美元的軍事援助。<sup>15</sup>到了戰後，為協助歐洲的重建，一九四七年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宣布實施以圍堵戰略為核心的「歐洲復興計畫」。接著，一九四八年四月，國會立法通過《經濟合作法》，並相應設置經濟合作署，主導對歐各國的援助計畫。這個為期四年，花費一百三十億美元的計畫，即一般所謂的馬歇爾計畫。<sup>16</sup>雖然近來的研究開始懷疑馬歇爾計畫在復興歐洲上的作用，並質疑美國慷慨解囊背後所隱藏的利益（借錢給歐洲各國買美國的貨物）。但無可否認，馬歇爾計畫不僅完成了美國在歐洲的地緣政治部署，預示了一九四八年以後歐洲的冷戰格局，同時奠定了以馬歇爾計畫為摹本的美援模式，確立美國對自身現代化發展經驗的信心。此後，美國模式的輸出，特別是美式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文化模式，幾乎成為美援必然伴隨的經濟與文化現象。<sup>17</sup>

韓戰爆發後，美援的重心從歐洲轉移到東亞，而臺灣即是此脈絡下受惠於美援。一九五一年十月，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並根據該法設立共同安全署，統整所有援外經濟計畫，接替已終止的馬歇爾計畫與經濟合作署。根據一九五三年共同安全署的國會報告，

美國援助臺灣的目的有三：維持經濟穩定、促進臺灣自給自足、協助美國軍事活動。<sup>18</sup>更明確地說，早期美援的主要目的是軍事防衛，意在圍堵中共，避免臺灣淪為共黨統治，故相關的經濟援助不是為了維護政局穩定、強化國防建設，就是要讓臺灣提早自給自足。隨著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以及臺灣政經局勢漸趨穩定，美援開始轉為計畫性經濟援助，目的在協助臺灣經濟自立。<sup>19</sup>這個時期援助的特點是，支援港口、水庫、電力與電信設施等基礎建設與公營事業（特別是臺電與電信局），對農業部門的資本形成也起了很大貢獻。從一九五一年到美援完全停止，美國提供的經濟金額約十五點八五億元，軍事的援助更高達二十三點八四億美元。<sup>20</sup>

15 文馨登，〈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一九五一—一九六五）〉，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九九〇。

16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Martin Schain, ed., *The Marshall Plan: Fifty Years Afte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Djelic, Marie-Laure, *Exporting the American Model: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Bus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吳曉敏，〈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一一），一九八八，頁一四五—一五八。

19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6, 同注十五，頁九一。

值得重視卻往往被忽略的是，美援還影響了臺灣的經濟政策，這事實上也意謂著美式現代性想像的輸出。眾所皆知，臺灣在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九年，曾實施所謂進口替代的經建計畫與政策，而這正是美國培養臺灣經濟自足所容許的。然而，隨著臺灣經濟逐漸穩定、成長，加上美國自身面臨國際收支惡化與海外投資需求等經濟轉型問題，一九五九年六月，美國共同安全署在臺分署長郝樂遜(Wesley C. Haralson)公開批評臺灣美援運用與管理不當、經濟資源錯置、投資不力、經濟危機潛伏等問題，並提出八點改革措施：一、限縮國防費用以利投資；二、實施遏止通膨的金融政策；三、改革稅制與掃除企業發展障礙；四、實施符合實際的單一匯率；五、解除外匯管制，鼓勵出口；六、設立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七、設立證交所，成立資本市場；八、公營事業民營化。<sup>21</sup>為回覆美方的壓力，國民黨政府遂依循郝氏的建言，於十二月提出「十九點改進財經措施」，並於隔年設立《獎勵投資條例》，一九六六年更設立加工出口區。由此開啟了臺灣所謂出口擴張時期的經建計畫，並成為日後臺灣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口中的自由化與市場經濟的開端。<sup>22</sup>實際上，臺灣不曾完全放棄進口替代的政策，其經濟發展模式是否符合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原理頗有疑義。但在社會科學家的協力下，這種美式現代性想像的輸出，不但在臺灣日益贏得主導論述的地位，同時，臺灣的經濟發展也反過來變成證成美式現代性工程的範本。<sup>23</sup>

如前所述，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由於越戰結束、石油危機與停滯性膨脹等國內外局勢變

化，美國開始其全球戰略布局的調整，拉攏中共並逐漸從東亞撤守，同時推動後福特主義的經濟結構轉型，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鬆綁了國際金融的匯兌體制。同時期的臺灣則因美中關係趨於正常化，在退出聯合國及臺美斷交後，似乎從國際法上的地位未定論狀態轉變成實質冷戰格局下地位未定狀態，從而遠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需面對後冷戰多變的局勢。

在此情況下，國府的統治在一九七〇年代面臨著內外交迫的正當性危機，雖能藉革新保臺的本土化政策脫困，卻也開啟了未來反對運動全國性論述與組織上集結的可能。<sup>24</sup>有趣的反差是，同一時期卻是臺灣經濟騰飛的時期。這時期臺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約百分之十，幾乎是歷來之最。也因此國民黨日漸改以經濟成功來取代已經失效的反攻論述，以及因中共成為中國的同義詞而陷於進退失據的中國民族主義，來正當化其政權。一九七三年，因應全球性經濟危機的來臨，行政院長蔣經國不顧眾人的反對，毅然推動總支出幾為當時中央政府預算二點五倍的十大建設（十大建設乃是統稱，若干建設乃是更早之前的規畫，甚

21 許松根，〈出口擴張與產業升級：戰後臺灣的個案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二〇〇一。

22 同注十八。

23 Shelley Rigger, *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24 湯志傑，〈重探臺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一九七〇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十一，二〇〇六，頁一四一—一九〇。

至在當時已經開工，例如中山高速公路、核一廠），企圖藉由擴大內需的計畫經濟方式，渡過石油危機的難關。雖然這可能帶來高通膨的疑慮，設立中油高雄煉油廠、中船的大造船廠、中鋼的大煉鋼廠等公營事業與公共工程，亦屬過時的計畫經濟與重工業思維，但在當時脈絡下，十大建設對經濟與民心的穩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時，隨著經濟面的考慮壓過了軍事考量，這似乎也意味著國民黨政權某種本土化與在地化的轉型，試圖走出國共內戰所遺留的軍事體制。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中臺三角關係有了更顯著的性質轉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中建交當天，中國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呼籲解除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及放棄武力解放臺灣，並提出兩岸三通、促進兩岸交流與和平統一等主張。一九八二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進而提出「一國兩制」做為解決臺灣問題與促進和平統一的方法。至於美國，則是由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來規範臺美交流。在新的局勢下，美國雖不願提供主權允諾及承擔必然出兵的義務，但表明會嚴重關切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決定臺灣前途的作為（不限於戰爭，也包括經濟制裁），並承諾持續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儘管如此，從美中建交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為止，可說是中美關係的十年蜜月期。雙方在政治、文化、科技與經濟上，進行廣泛的合作與交流，並在全球戰略問題、聯合國議案等方面進行深入對話。美中合作不但對臺灣造成日益沉重的壓力，也讓臺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困。因應此一變局，當時的總

統蔣經國則回以著名的三不政策，堅持不與中國接觸、談判、妥協。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美中臺三角關係在一九八〇年代實已開始進入後冷戰與後國共內戰的格局，但三方仍皆固守某種冷戰思維。美國試圖聯合中國在全球布局上圍堵與制衡蘇聯，中國則試圖在放棄軍事對立的前提下，依國共內戰的框架來解決臺灣問題，而臺灣更是堅守漢賊不兩立的政策，繼續圍堵、封鎖與自我封鎖。

然而，在經濟面向上，一九八〇年代出現了有趣的重要轉折。隨著一九七九年柴契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及一九八〇年雷根出任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的時代遂揭開序幕。雷根政府試圖以貨幣主義、供給面經濟學、去管制與自由化政策來改善美國石油危機以來的景氣低迷，以打擊通膨作為主要經濟目標（取代充分就業），並試圖透過減稅、縮小政府的經濟干預來刺激經濟成長，<sup>25</sup>同時卻自相矛盾地大幅擴張美國的全球軍備及實施星戰計畫。

同時期的中國亦大幅實施改革開放措施。一九七八年，中國宣告取消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一九七九年則在農村實施「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後來更在鄉鎮實施各種承包制度，促成鄉鎮企業的興起），並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負責吸引外資，引入外來產業與技術，日後更擴大到沿海諸多城市與鄉鎮。一九八

25 參見本書蔡宏政，〈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

一年，鄧小平正式宣布以四個現代化為經建目標。一九八八年，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正面肯定私營經濟的存在。

至於臺灣，一九八〇年代已成為東亞經濟奇蹟（日本加亞洲四小龍）的一部分。然而，面對日益惡化的貿易逆差，美國這時一改先前扶持及寬容東亞國家的態度，祭出「貿易法」中著名的「三〇一特別條款」，試圖改善美國與東亞不平衡的貿易狀況、打破東亞對於國內產業與市場的保護（特別是在美國農產品進口與關稅降低、減少各國對於出口的稅務與外匯上的補貼）、要求各國制定嚴格且有利於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政策等。並且，更於一九八五年透過著名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使得美元相對於日幣與德國馬克貶值（因而帶動臺幣對於美元的升值），來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在此情況下，甫晉升亞洲四小龍的臺灣，馬上就面臨開放國內市場、產業轉型與出走的壓力，特別是因臺幣升值與國內勞動成本提高而來的艱困挑戰。<sup>26</sup>

綜合言之，在一九八〇年代，標榜民主、自由、開放、富足、繁榮、多元，甚至進步等美國價值的現代性想像與社會工程，開始清楚地浮現在世人的眼前。這不單表現在雷根主義的出現，同時也反映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中，更具體展現在東亞面對來自美國壓力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威權轉型中。

到一九八九年，隨著東歐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先後瓦解，結束冷戰兩極分化對立的世界格局，美國似毫無疑義地成為全球的唯一霸權。這樣的局勢反映在東亞的格局上，則是著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導致美中關係冷卻，以及美國與歐盟聯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措施。同時，中國內部一度也出現改革開放路線的搖擺。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才真正確立了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正式邁向紅色資本主義的時代。

至於美國，一九九〇年代則開啟了所謂「新經濟」與「知識經濟」的轉型，不但改善了國內的經濟狀況，也擺平了來自東亞的競爭（特別是日本）。同時，美國更在國際上主導從各國多邊協定的關貿總協（GATT）變成常設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轉變，以推動所謂的經濟全球化，並藉世界銀行（WB）與國際貨幣組織（IMF）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此情況下，臺灣一方面透過由電子業參與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以維持既有的代工（OEM）地位，另一方面則以戒急用忍政策回應中國崛起，等同宣告先前以中國為腹地的亞太營運中心想像的破產。

正式邁入後冷戰的時代後，臺海形勢在一九九〇年代也出現一個重要轉折。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三不政策開始鬆動。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

<sup>26</sup> 同上。

成立海基會，開始準備與中國接觸。一九九二年，臺灣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於香港展開第一次非官方正式接觸，成為日後所謂「九二共識」爭議的起點。一九九三年兩會於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象徵兩岸關係正式破冰。然而，就在美中關係因天安門事件陷入低谷，中臺關係解凍之際，海峽兩岸的關係卻呈現極度緊張情勢，特別是所謂的「臺海飛彈危機」。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令中國研判美國試圖助長臺獨勢力，於是發動飛彈與軍事演習抗議。一九九六年三月，臺灣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中國再次發動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試圖藉恫嚇干涉選舉結果。在危機一觸即發的情勢下，美國迂迴宣告第七艦隊航空母艦將技術性經過臺海水域。一九九九年李登輝總統發表所謂「兩國論」，再次升高臺海形勢，中國本來要再度進行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則因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而作罷。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宣布「四不一沒有」政策。二〇〇二年，陳水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主張，明確拒絕成為第二個香港及一國兩制。面對臺灣的不斷試探，中國則於二〇〇五年由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予以回應。

從後冷戰格局來看，東亞在一九九〇年代前期面臨美國自由化、市場化與民主化的強大壓力。一九九四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甚至提出所謂建基於儒家倫理的亞洲價值，以回應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然而，一九九七年因熱錢的移動與炒作而引爆的亞洲金融風暴，毋寧已宣告了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終結，以及裙帶資本主義的破產。因此，接受美國主導的

新自由主義全球格局，已成為東亞國家須面對的政經局勢。<sup>27</sup>當中國決定走向紅色資本主義，並因世界工廠的角色而與美國有日趨相近的利益及日益密切的合作的情況下，臺灣雖因美中間仍有競爭、敵對關係而不致一夕間被犧牲，卻不免淪為兩強間籌碼。可是臺灣憑藉民主化成功創造出自己的契機，飛彈危機清楚顯示中國容不下臺灣基於民主而來的超越國共內戰格局的嘗試，而仍然根據冷戰思維，以軍事化的方式處理臺海問題。

當時序推進到二十一世紀，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相當程度改變了美國對於全球戰略布局的思考，使得反恐怖主義成為迄今的主軸。相應地，美國不再視中國為潛在的最大威脅者，轉而關注伊斯蘭恐怖主義與北韓，令中國得以藉反恐及影響北韓開展出與美合作的新面向。同時，因應經濟成長停滯及中國崛起，臺灣在陳水扁總統上台後鬆綁了戒急用忍的政策，代以所謂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促成小三通實現。然而，在政治的面向上，一邊一國說與反分裂國家法卻令兩岸官方交流停滯，甚至出現所謂的「烽火外交」。而正是在扁政府遭中國封鎖的狀況下，由國民黨前副主席江丙坤與榮譽主席連戰於二〇〇五年完成了國共內戰以來領導人會晤的破冰之旅，為後來馬政府的重啟兩岸交流埋下伏筆。

二〇〇八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馬英九政府提出新三不政策，在承認所謂「一個中國、

<sup>27</sup> 同上。

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下，恢復兩岸交流。馬英九政府不僅實現了大三通，更積極推動所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ECFA的重要背景是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二〇〇〇年以後，各國政府意識到在WTO的組織架構下處理各國複雜的自由貿易與經濟統合，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基於WTO的精神與規則，各國開始推動雙邊到多邊的FTA。其中，一九九四年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與一九九〇年代歐盟的整合可謂重要先驅。在此示範效應下，區域經濟整合成為二〇〇〇年以後的勢不可擋的趨勢。有鑑於此，二〇〇一年，中國與東協各國決定成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即東協加一，ACFTA)，並於二〇〇二年簽訂協議，決定二〇一〇年正式啟動自由貿易區。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為避免臺灣經濟的邊緣化危機，馬政府決定與中國簽訂ECFA。引爆太陽花運動的服貿協議，即為ECFA架構下的後續協議。

事實上，ECFA的簽訂，意味著在美國引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的背景下，面對全球性經濟衰退，及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臺灣最大貿易夥伴的情況下，馬政府選擇擁抱與中國的經濟統合，做為景氣低迷的解藥。對馬政府而言，這不僅在經濟上符合臺灣利益，意識型態上更是符合後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基調。而且，在二〇一〇年以後，隨著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出爐，以及中國企圖令東協加一深化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CP)，臺灣似乎面臨著親美或親中的戰略伙伴選擇的擺盪。

二〇一二年馬英九儘管在民意低迷的情況下，卻能靠「九二共識牌」的加持而連任總統成功，他在上任後會繼續推動一中市場與深化兩岸經濟統合，甚或朝簽訂兩岸政治協議的方向積極試探，並不令人意外。因此，在第二任總統任內，加速傾中路線已成馬政府的標誌，乃至為化解美國的疑慮，特別派出深獲馬總統信任的金溥聰出任駐美代表。同時，在野的民進黨同樣將敗選歸因於中國政策，相信往中國傾斜係其邁向執政所必要的最後一哩路。<sup>28</sup>正是在這種連任成功的魔術效應催眠下，儘管馬政府日益傾中，乃至半公開地宣告政治談判的可能，臺灣的政界與輿論卻缺乏任何有力的批判聲音，乃至令國際輿論認為與中國進一步統合乃是臺灣社會的整體共識。

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太陽花運動藉由發動公民社會自身的力量，質疑傾中路線的荒謬性，成功阻擋，乃至逆轉了上述的趨勢。從後冷戰格局來看，馬政府的傾中路線可謂架構在國共內戰的歷史框架上，這一定程度上是歷史的倒退。中國二〇〇〇年以後的經濟統合、以經逼政，雖放棄了軍事上的文攻武嚇，但中國對臺灣許多過氣政客의 拉攏，以及在ECFA、服貿、貨貿上所謂的「讓利」，依然侷限於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思維。就此

<sup>28</sup> 民進黨《二〇一二大選檢討報告》明確地指出，兩岸關係乃民進黨執政的最後一哩路，因此建議民進黨更具體展開與中國的雙向交流，以擺脫「反中」、「鎖國」等刻板印象。

而言，太陽花運動不但遏阻了兩岸權貴資本結盟掠奪的結構趨勢，一定程度也打斷了美中日益趨近的世界局勢，同時更開啟了後冷戰思維的可能。冷戰早結束十幾二十年，我們實有必要跳出冷戰的格局，從新的思維定位臺灣，找到小國自主的彈性策略，才足以在美中之間週旋，而不致為任何一方所賣。

#### 四、太陽花運動的結構、能動性與文化效應

就像是每場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都有其社會結構條件與歷史偶連性，以事後回顧的角度，我們的確可以辨識出太陽花運動興起時所面對的結構性力量與趨勢。首先，就世界格局來看，從新自由主義在冷戰後期浮現，以及在後冷戰時期日益當道獨霸，不難觀察到各國皆出現福利縮減及貧富日趨惡化的大趨勢。<sup>29</sup>因此，當二〇〇八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海嘯，拆穿自由貿易與解除管制的神話後，更點燃了世界各地往往為失業及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所苦的年輕世代的憤懣，令階級與世代的議題重返政治的討論中。就此而言，一九九九年以降的反全球化運動、二〇一〇年的阿拉伯之春，乃至於最高峰的二〇一一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可謂開啟了全球網路青年世代各式占領運動的先鋒。

其次，就東亞地緣政治關係來看，美中臺三角關係的變化，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臺灣成為美中關係的籌碼，臺灣不僅有著傳統自我標榜的經濟奇蹟難以為繼的問題，同時，國內更瀰漫著邊緣化危機的憂慮。中國因素似乎也成為左右臺灣政治局勢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誠如吳介民所指出的，太陽花運動不但是長期動員的結果，更是臺灣面對中國因素的抗爭波段的最高峰。<sup>30</sup>二〇〇八年陳雲林來臺，因過度維安措施所引爆的野草莓學運，可以說是太陽花運動的先驅，許多太陽花青年世代，特別是運動幹部，基本上都是在野草莓學運完成了初次的政治啟蒙。<sup>31</sup>

最後，就臺灣島內情形來說，馬政府上台後諸多的不當作為，以及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等結構因素，同樣早製造、累積許多社會不滿，就如「崩世代」的意象所傳達的，以及他連任時的低民意支持所具體反映出來的。因此，當二〇一四年馬王政爭，執政當局的內部

29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著，羅耀宗譯，《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臺北：天下雜誌，二〇一三。

30 吳介民，《到太陽花之路：臺灣公民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日本台灣學會報》十七，二〇一五；及本書中與廖美台著〈占領，打破命定論〉。

31 林傳凱，《二〇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歷史社會學視角的初步分析》，收於劉定綱編，《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看見希望世代》，臺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一四，頁二二八—二六八。

分裂，的確為太陽花運動開啟了難得的政治機會，因而使得占領立法院得以可能。<sup>32</sup>

然而，我們也必須提醒這些結構性條件或趨勢，不必然會引發太陽花運動，運動之所以可能仍充滿著許多歷史偶連性。臺灣國內外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固然蓄積了豐沛的抗議潛能，使得抗議行動似乎隨時可能發生，但事實上，幾乎從來就沒有人能正確預測何時才會大爆發。就像我們現在比較清楚地知道，能成功衝進立法院，其實是個幸運的偶然。雖然樂生、野草莓、反媒體壟斷、苗栗大埔……等一系列的社會抗議事件，早在人際網絡串連的基礎上培養出一群能征慣戰的運動幹部，也在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八日實際演練過占領內政部所在的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從而大幅提高了衝進立法院的機率，但絕大多數的行動者事先都沒認真想過他們真能成功占領立法院，太陽花運動的規模似乎也超過這些運動幹部當初的預期。<sup>33</sup>同樣的，在太陽花運動之前，無論馬政府的前國策顧問郝明義所發出對服貿的質疑，抑或眾多的NGO與學生團體所提出召開公聽會、逐條表決與先通過監督條例等呼求，都無法喚起主流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心。當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主持會議的立法委員張慶忠於半分鐘內違法偷渡，這些學生與社運工作者基於義憤與絕望，認為當前的代議體制無法真正保護一般人民的利益，試圖盡最後人事的心態下，才會有占領立法院的盤算與舉動。<sup>34</sup>然而，若非他們湊巧成功攻占國會議事殿堂，並立刻透過網路媒介即時傳送自己的聲音，令這個前所未有的激進行動成功吸引到媒體與大眾的注目，恐怕根本

就不會有所謂的太陽花運動。與此類似的，若非有三二四試圖進占行政院廣場的行動，並意外招致民主化後的臺灣已屬罕見的警察的強勢流血鎮壓，以致進一步引發三三〇的五十萬黑潮上街，震撼全臺，太陽花運動恐怕也無法發揮它在發起之初自己從未料到的影響力。

因此，太陽花運動的難能可貴之處，正在於行動者在多數人不看好甚或自身都感到絕望的情況下，卻能成功打開一個新的局面。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以來，若不是眾多的NGO與學生團體便持續關心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的議題，努力地抗議、監督與施壓，服貿協議可能早在反對黨棄守下通過。更遑論太陽花運動之後，不僅服貿退回到立法院，兩岸監督條例也排入了立法進程，馬政府的兩岸政治協議等構想也宣告破局，執政當局的傾中路線即便尚不能說是扭轉，至少一定程度遭到中斷。<sup>35</sup>

此外，就運動就是訊息的觀點來看，我們也應該留意太陽花所傳達的訊息與所造成認

32 參見本書何明修〈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

33 晏山農等，《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二〇一五。

34 同上。

35 雖然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最後半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仍順利舉行了馬習會，但這主要是基於南海情勢的緊張與主權爭議，由中國主動邀請（因臺灣對於太平島進行實質占領），而非兩岸政治協議有任何實質進展。事實上，南海情勢，特別是太平島主權爭議亦跟冷戰格局的遺緒有關。

知與文化上的改變。當太陽花運動所喊出「捍衛民主、退回服貿」、「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自己國家自己救」等口號，並號召數萬名原不關心政治的青年世代長期堅守立法院周遭，我們似乎已不再能用草莓族、政治冷漠、虛無主義世代來看待臺灣青年世代，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一方面青年世代造就了太陽花運動，另一方面太陽花運動也改變了臺灣青年世代。同樣的，太陽花運動「似乎」也使臺灣人民似乎開始意識到改變現狀是可能的。無論是太陽花後續的割鬚尾運動、修改公投法等運動，以及二〇一四年底九合一選舉執政黨的挫敗、柯文哲旋風（兩岸政商權貴關係在此次選舉裡受到前所未有的檢視），還是二〇一六年總統暨立委選舉中青年從政的諸多表態與第三勢力的籌組。太陽花運動不僅使得兩岸權貴遭到檢視、世代鬥爭具形，更使得人民開始「試圖」拋棄已被理所當然化的兩黨政治迷思，勇於挑戰長久以來已為人詬病的藍綠惡鬥的政治現實（雖然，二〇一六年大選中，第三勢力只有「時代力量」獲得成功，但這頗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除了在國內政治認知框架與現實的改變外，太陽花運動在東亞地緣政治上也產生了極大的作用。雖然太陽花的主軸是反黑箱、捍衛民主，反自由貿易只是較微弱的副旋律，然而在前述後冷戰美中趨近壓縮臺灣的選擇空間，以及日益傾中的國民黨政權卻能一再勝選的背景下，不論是捍衛臺灣得之不易的民主，或是主張有條件地進行自由貿易，一定程度上都蘊含了對中國說不的意涵，從而可形成遲緩或遏阻臺灣與東亞形成中的政經結構趨勢

的效應。而且，更重要的是太陽花運動的崛起，清楚反映了臺灣公民社會的意向與力量，提供國際社會重新檢視執政黨傾中路線的正當性問題。至少在美國方面，太陽花運動似乎提供二〇一〇年來開始有棄臺論聲音出現的美國得以、同時也必須重新評估其亞太戰略布局的契機。眾所周知，二〇〇九年歐巴馬上任美國總統檢討美國對外政策後，便表露了「重返亞太」的企圖，二〇一二年六月，美國國防部長在通稱為「香格里拉對話」的亞洲安全峰會閉幕時，再次清楚表達「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值得注意的是，二〇一四年四月，太陽花運動行將告一段落之際，美國在臺協會發言人金明（Mark Zimmer）明確表示，反服貿抗爭不會影響臺灣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甚至，二〇一五年四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更不避諱地跨界評論起財經事務，除暗示中國籌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是為削弱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更明白強調對亞太再平衡戰略來說，TPP有若一艘航母，但它締結的時間卻正在流逝。此外，在中國方面，甫於太陽花運動結束之際，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臺之前甚至表示，願意與太陽花學生對話，公開承認兩岸和平發展紅利分配不均，願意與基層民眾、中小企業主多多交流（即便這可能只是新的統戰形式，但至少中國也無法忽視太陽花運動所傳達的訊息，公開承認既有統戰路線有檢討必要）。換言之，太陽花運動除了改變了國內人們對於現狀的認知之外，在地緣政治上，的確也像震撼彈一樣，為臺灣炸開了一些可能的契機。

總而言之，太陽花運動的歷史意義，正在於透過行動者堅持不懈的能動性，當在野的民進黨都因低民意的馬英九依然可再度當選總統，而強調思考執政最後一哩路的必要，準備選擇向中國傾斜時，<sup>36</sup>以公民運動的力量阻擋，甚或逆轉了上述歷史趨勢。當太陽花運動形式上暫告落幕時，它改變政經結構的作用或許還不那麼明顯。但是當執政的國民黨在二〇一四年底九合一選舉空前的挫敗，兩岸政商權貴關係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檢視；二〇一六年初總統暨立委選舉風起雲湧的青年從政與第三勢力的集結，太陽花運動改變臺灣政經結構的里程碑地位可謂已告確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太陽花運動不但反映出臺灣從冷戰對抗的前線到走向擺盪於美中之間的歷史轉折，同時也開啟了走向自主而彈性的小國策略的契機。然而，太陽花運動與其後續效應，是否真能徹底翻轉臺灣、乃至於東亞與世界的政經結構，這恐怕只有未來的歷史才能夠蓋棺論定。

## 五、結論：東亞冷戰、後冷戰格局與太陽花運動的歷史意義

當我們從長期歷史眼光來審視太陽花學運，並且從冷戰、後冷戰的格局來討論臺灣定位的變化與太陽花運動所造成的改變，大致上可以得到三點結論：

(一) 東亞冷戰到後冷戰格局的轉折及其效果：就冷戰而言，二戰後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受惠於冷戰格局。而美中關係的正常化，也促使一九七〇年代東亞提前進入後冷戰格局，中國的崛起一定程度也受惠與此。就此而言，冷戰到後冷戰的轉折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參考框架。因此，從這個轉折來看，國共兩黨試圖利用國共內戰或後國共內戰的框架來處置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實際上是罔顧冷戰所帶來的效果，因為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世界已經改變——不論這個世界是由何種主導邏輯所構作出來的。只是當中國依循著國共內戰延續來定位兩岸問題（國共內戰乃是冷戰格局的同期產物），臺灣則是依然爭吵著統獨問題（統獨問題乃是冷戰格局下的產物），這似乎只突顯出一個尷尬的事實：中國根本沒有能力走出冷戰的特殊格局，而臺灣雖偶有突破此框架的思維浮現，卻依舊不免常為此框架所困。就此而言，中國的大國崛起可能只是一種假象。

太陽花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突顯出幾個有趣的問題：首先，冷戰的效果確實存在，它不僅形塑臺灣與中國的自我認定，冷戰到後冷戰所造成的擠壓效應，更迫使我们採取不同的區隔、應對方式。其次，太陽花運動所贏得的廣泛支持與其後續的效應，正好表現出時代真的變了，世界也真的不同的事實。經濟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某種已在臺灣人民身

<sup>36</sup> 即便發生了太陽花運動，但民進黨仍有不少人認為，「傾中」路線是攤開橫在執政最後一哩路障礙的必要手段。例如，二〇一四年六月，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前夕，前立委陳昭南、郭正亮等人，甚至發起凍結「台獨黨綱」的連署，避免「台獨黨綱」成為民進黨兩岸交流的絆腳石，以及國際社會對於民進黨執政疑慮的根源。

上肉身化的民主文化價值，似乎成為了兩岸最難以跨越的鴻溝，即便臺式代議民主並不那麼令人滿意。最後，冷戰即使決定或影響臺灣或中國的格局，但它並未決定臺灣或中國如何因應局勢變化的過程。因此，當中國無法展現出真正大國的樣態，解放或統一臺灣成了獲取口惠的說法，這不是局勢所逼，而是主動所為。反過來，一味地利用中國的經濟解決臺灣所面對的問題，同樣也是主動所致的結果。然而，說詞終究只是說詞，正如同國王新衣一樣，這些說法與政策已經不起太陽花運動衝擊，徹底地展現了片面性與荒謬性。

(二) 在東亞地緣政治上臺灣地位的轉變與關鍵性：誠如前述，臺灣定位的改變與中國的崛起，的確與冷戰、後冷戰格局有關。中國的崛起固然受惠於東亞後冷戰格局的轉變，卻也將中國牢牢地鎖在大陸板塊上，同時迫使它採取有別於美式現代性想像的變形發展策略。同樣的，臺灣的經濟奇蹟也受惠東亞的冷戰格局，而冷戰到後冷戰的格局變化，的確也對「何謂臺灣」的問題產生若干文化上的效果，並且有著時代上的變異（如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九〇年代的差異）。然而，美中臺三角關係的變化、臺灣與中國政經實力的消長，並未改變臺灣的關鍵地位。當中國試圖透過「一帶一路」來突破東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島鏈的封鎖與限制，以及美國宣示重返亞太，這些都恰好凸顯了在中國崛起問題上、在東亞霸權爭奪上，臺灣依然扮演著關鍵性的位置。

恰恰在這種因冷戰而生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上，我們可以說，太陽花運動在文化上帶來了三個重要效果：首先，運動本身體現出臺灣的公共價值、公共文化（至少是現階段的價值）。其次，這種文化表現的情況揭露了冷戰的文化效果。最後，太陽花運動是場價值宣誓的活動，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甚至比起香港的占中運動，這種宣誓效果更加明確。

(三) 太陽花運動的歷史意義：如上所分析的，太陽花運動不僅改變了臺灣青年世代、一般民眾對於現狀的認知，同時，在地緣政治的格局也產生了若干衝擊效應，為臺灣的前途開展出一些新的可能契機。至此，太陽花運動做為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已毋庸置疑。然而，倘若我們就冷戰格局的演變與臺灣的歷史發展來看，太陽花運動毋寧拋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上述這一切是否和特定的現代性想像與計畫有所關連，是所謂的美國中心主義、東亞經濟奇蹟、亞洲價值、還是中國大國崛起？相信，答案是肯定的。特別是冷戰、後冷戰的格局與區隔效果，具體揭露了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與臺灣經驗恰恰依循著不同軌跡，故造就了不同的現代性想像。因此，我們必須關心，當中國面臨困境，其未來究竟會呈現出何種可能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變化又將如何關連到臺灣的困境與未來？這些常易為實際歷史的曲折所遮掩，以及為運動的熱鬧場面或戲劇發展而常讓人遺忘的深刻問題，很顯然已經為太陽花運動所提點出來，即便這種提點其實仍屬於相當初步的狀態，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化相關的詮釋，以坐實它的歷史意義。

## 參考書目

中文

- 文馨瑩(一九九〇)。*《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一九五二—一九六五)》*。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何明修(二〇一六)。*《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臺北：左岸文化。本書章節。
- 吳介民(二〇一五)。*《到太陽花之路：臺灣公民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日本台灣學會報》十七。
- 吳介民、廖美(二〇一六)。*《占領、打破命定論》*，《*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臺北：左岸文化。本書章節。
- 吳聰敏(一九八八)。*《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一(一)。頁一四五—一五八。
- 吳鴻昌、湯志傑(二〇一五)。*《臺灣無可迴避的議題：欣迎《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的面世》*，《臺灣社會學刊》五十六。頁二四三—二四八。
- 汪宏倫(主編)(二〇一四)。*《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林傳凱(二〇一四)。*《二〇一四年「反服貿」抗爭中的權力、民主與異質實踐：歷史社會學視角的初步分析》*。收於劉定綱編，《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看見希望世代》。臺北：奇異果文創。頁二二八—二六八。
- 晏山農等(二〇一五)。*《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
- 許松根(二〇〇一)。*《出口擴張與產業升級：戰後臺灣的個案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 湯志傑(二〇〇六)。*《重探臺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一九七〇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學》十二。頁一四一—一九〇。
- 蔡宏政(二〇一六)。*《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臺北：左岸文化。本書章節。

英文

- Amadae, S. M. (2003).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jelic, Marie-Laure (1998). *Exporting the American Model: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Bus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by, Jonathan (2008).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Ecco.
- Fenby, Jonathan (2013). *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 How It Got There, and Where It Is Heading*. Reprinted Edition. Overlook TP.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 Halberstam, David (2007).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ton.
- Hara, Kimie (2006).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Hogan, Michael J (1987).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y, Neil H. (1966).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F. A. Praeger.
- Kennan, George F.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12. pp. 566-582.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ffler, Melvyn P. and Odd Arne Westad, (ed.)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1, Origi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ffler, Melvyn P. and Odd Arne Westad, (ed.)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2, Crises and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ffler, Melvyn P. and Odd Arne Westad, (ed.) (20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3, End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ited by John Keane and Paul Mi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igger, Shelley (2011). *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Sanchez-Sibony, O. (2014). *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in, Martin, ed. (2001). *The Marshall Plan: Fifty Years After*. New York: Palgrave.
- Schaller, Michael (1985).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羅耀宗譯) (二〇一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臺北：天下雜誌。
- Trani, Eugene P. and Donald E. Davis (2002). *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吳介民，『太陽花運動』への道——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する抵抗——，《日本台湾学会会報》第十七号，二〇一五年九月，頁一—三七。作者感謝廖卿樺、黃佩君、施懿倫等研究協助，也感謝本文匿名審查者與兩位主編的修改意見。

## 占領，打破命定論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所  
副研究員

廖美

中研院社會所  
博士後研究員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第二種中國想像》，主編《權力資本雙螺旋：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合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翻譯赫緒曼著《反動的修辭》。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 (CUNY Graduate Center) 經濟學博士。研究興趣：勞動經濟、薪資與所得分析、年金與健保方案、拉丁美洲政治經濟，以及全球草根經濟創新運動。著作刊登於《思想》等刊物。